

纽伦堡的改教家： 论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生平、思想与奥西安德之争

郭思恒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提要: 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主要领导人, 这一“正确”的历史印象掩盖了诸多改教家的改教事迹与思想纷争。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是德国宗教改革事业的第一代改教家, 然而其生平事迹与主要思想却鲜见于汉语学术界。通过梳理奥西安德的学术史沉浮, 挖掘其生平事迹与主要思想, 及其引发的思想论战, 旨在勾勒奥西安德改教家历史形象的同时, 恢复马丁·路德之外的改教家的历史书写与研究, 从而更为深入与细致地描摹出宗教改革的全貌图景, 拓宽汉语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认识。

关键词: 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 宗教改革; 纽伦堡; “奥西安德之争”

作者: 郭思恒,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 德国古典美学、中国近代艺术理论、宗教美学。电子邮箱: shgforkh2020@126.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0992-0339>。

马丁·路德所引发的宗教改革事业, 从各个方面冲击了西方世界的固有秩序, 某种意义上马丁·路德被视为现代性的开启者¹, 关于路德的生平与思想研究也愈发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深入。当马丁·路德作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被“重新发现”时, 对围绕在其身边的人物进行发掘与研究似乎也显得更有必要。一方面, 在共时的历史背景下, 路德的思想影响不是单向的, 在与改教家们交流, 与对手的辩论中, 在和政治家的合作时, 路德与这些历史人物必将产生许多微妙的互动; 而另一方面,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 即便路德去世之后, 那些还在世的人物里也通过自己的选择, 去显现着或者“对抗着”路德的思想因素。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 (Andreas Osiander, 1498-1552) 便是其中的一位人物, 他被称为“纽伦堡的改教家” (the reformer of Nürnberg)²。这位来自贡岑豪森 (Gunzenhausen) 最后成为名震一时的“奥西安德之争” (The Osianderic Controversy, 1549-1566) 核心人物的改教家, 在路德在世的时候便跟随其左右, 却在路德谢世后于路德宗内部引起一场关于称义问题的大争论。

¹ 黄保罗 Huang Baoluo,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与现代性的开启》 *Mading Lude zongjiaogaige sixiang yu xiandaixing de kaiqi* [Martin Luther's Reformation Thought and the Opening of Modernity], 《宗教学研究》 *Zongjiaoxue yanjiu* [Religious Studies], No. 2, (2022), 202-210。

² Katharine Jackson Lualdi & Anne T. Thayer, *Penitence in the Age of Reformations*, (Aldershot & Burlington USA & Singapore & Sydney: Ashgate, 2000), 33.

奥西安德与这场称义观的大讨论的影响愈发受到了重视，正如大卫·C. 斯泰因梅茨（David C. Steinmetz）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

路德对称义、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以及基督身体无处不在的理解是这些改革者的神学起点。即使像墨兰顿（Melanchthon）的情况一样，他们即便偏离了路德的教导，也是通过修改而不是完全拒绝它来做到这一点的。事实上，路德教内部最激烈的斗争往往是像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和尼各拉斯·冯·安斯多弗（Nikolaus von Amsdorf）这样的人之间，他们对一个问题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且在各自的理由下声称，自己忠于路德思想中被其他路德信徒掩盖的主题。³

由此可见，这一争论关涉到的不仅是对某一具体信仰问题与教义概念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辩论”，争论背后还指向着路德宗改教家们对路德遗产的不同态度。而这一场争论似乎尚未引起汉语学界的研究兴趣，甚至对于这一论争的关键人物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我们似乎也知之甚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生平事迹与主要思想，特别是他在这一论争的处境与言行作最为基本的历史概述，并在这一探究过程中引入并借鉴国外研究者的成果，以期为汉语学界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史视野。

一、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在学术史中的沉与浮

在对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生平进行勾勒之前，不妨对关于奥西安德的研究作出简要的学术史梳理。从最新的考证来看，最早的“现代”（modern）意义上的奥西安德传记之一是出自卡尔·海因里希·威尔肯（Carl Heinrich Wilken, 1801-1866）之手的《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生活、教学与写作》（*Andreas Osianders Leben, Lehre und Schrifte*），他是德国东北部施特拉尔松德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的传教士。1844年，威尔肯把他的书献给了柯尼斯堡大学的神学院，以纪念该校建校三百周年。⁴奥西安德长期以来被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马丁·施图佩里希（Martin Stupperich）在《奥西安德在普鲁士：1549-1522》（*Osiander in Preußen: 1549-1552*, 1973）为这一情况感到惊讶：“关于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著作相对较少。这个事实令人惊讶，奥西安德是第一代改革家之一，在他们中占有杰出的地位：自1523年以来，他在帝国城市纽伦堡的改革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几乎是纽伦堡地区教会组织重组的所有专家，在这一过程中，他坚决反对旧信徒教会和‘狂热’运动（schwärmerische Bewegungen）”⁵。施图佩里希认为人们对奥西安德的著作兴趣低落，在某些意义上是因为奥西安德卷入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神学纷争，而人们在很长时期内对由神学而引起的纷争表示厌恶，施图佩里希也许是站在历史上的神学家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情况，教会内部对引起分裂的争论往往敬而远之，以至于尽量少提。如同R.西伯格（R. Seeberg）在《教义史教材》（*Text-Book of the History of Doctrines*）的第二卷德文译本前言所说的那样：

在许多教义历史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有关奥利金（Origen）和亚历山大学派（the Damascene）的内容，甚至有关奥西安德和开姆尼茨（Chemnitz）的内容，但只有有关四位伟大改革者的简略描述，并

³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⁴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6.

⁵ Martin Stupperich, *Osiander in Preußen: 1549-1552*,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3), 1.

且这些描述充满了强烈的教条偏见。我在这里尝试弥补这一缺陷，尽管关于路德的部分因此几乎演变成一篇小专著，但仍未超出教义历史的适当范围。⁶

西伯格在此处将奥西安德与奥利金相提并论，众所周知奥利金是亚历山大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过“永恒受生说”，后来被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定为异端，罗杰·奥尔森评价其为：“奥利金是基督教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典型，尽其一生为信仰而活。在另一方面，他关于神、三位一体与耶稣基督的教导，留下问题重重的遗产，最终引发了教会的内战”⁷，虽然奥西安德无法与奥利金在神学思想史的地位上相提并论，但二人都在死后留下了给后人不断争吵的神学议题，而且二人都对异教知识有着天然的亲近——奥利金深受希腊文化熏陶，并与新柏拉图主义者过从甚密⁸，而奥西安德则精通希伯来文，甚至学习阿拉姆语（这种语言被认为是耶稣时代犹太人的日常语言，也是旧约中《以斯帖记》与《但以理书》所用的语言）⁹。亲近异教知识且被视为异类的神学家难免因为“教条偏见”，而只能在历史文献中留下极其简短的描述。

另一方面，奥西安德的同时代人似乎对他也心怀不满而不愿说起，至少从笔者所掌握的前人研究来看，奥西安德被描绘成一个才华横溢但具有强烈个人缺陷的人，这一特点将在下文论述。总的来说，施图佩里希的著作是考察奥西安德生平的重要研究，这本书特别关注了奥西安德与其他人的神学争论，较为清晰地梳理“奥西安德之争”来龙去脉。施图佩里希强调了对奥西安德及其涉及的神学争论的研究，有利于改变人们对宗教改革的片面了解。此外，奥西安德为人所遗忘的基础原因是历史文献处理的难度，施图佩里希发现了奥西安德许多未被发表和整理的作品，这些16世纪的文献辩读处理十分困难¹⁰，这一位被同时代人不愿多提的改教家在16世纪发行了不少论战小册子，然而对他著作的现代版本整理直到1997年才完成。格哈德·穆勒（Gerhard Müller）与戈特弗里德·塞巴斯（Gottfried Seebaß）编订了十卷本《奥西安德全集：著作与书信》¹¹，并在1975至1997年间陆续出版，这一工作把奥西安德的信件与神学论文尽皆囊括在内，第一卷刚出版便收到了“该版本将受到所有与奥西安德或纽伦堡研究有接触的人的欢迎”¹²的赞誉。

奥西安德文献资料的获取难度是其研究开展的难点，关于他的文献整理工作刚刚完成不到三十年，尽管如此，早在1870年的时候，威廉·恩斯特·莫勒（Wilhelm Ernst Möller, 1827-1892）¹³就出版《奥西安德：生平与文集选编》（*Andreas Osiander Leben und ausgewählte Schriften*, 1870），展现了他对奥西安德的生平进行梳理与文集的编选工作。在一著作的前言，莫勒写道：“奥西安德的书信是有价值的，

⁶ Reinhold Seeberg, *Text-book of the history of doctrines (Complete in Two Volumes)*, vol. 2,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64), vii-viii.

⁷ 罗杰·奥尔森 Roger E. Olson,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Jidujiao sixiangshi* [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吴瑞诚 Wu Ruicheng、徐成德 Xu Chengde 译, 周学信 Zhou Xuexin 校,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4, 104.

⁸ 同上书, 第93页。

⁹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30.

¹⁰ Martin Stupperich, *Osiander in Preußen: 1549-1552*,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3), 2-3.

¹¹ 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著作、书信由 Gerhard Müller 和 Gottfried Seebaß 编为十卷本的《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全集：著作与书信》，见 Andreas Osiander d. Ä., *Gesamtausgabe: Schriften und Briefe*, 10 vols., eds. by Gerhard Müller & Gottfried Seebass, (Gütersloh, 1975-97).

¹² J. Wayne Baker, "Review: Schriften und Briefe 1522 bis März 1525. Gesamtausgabe. Band I. Andreas Osiander d. A. by Gerhard Müll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8, no. 3, (1977), 124.

¹³ 威廉·莫勒，德国路德宗神学家，神学博士，曾于哈雷大学、基尔大学任教，也曾于柯尼斯堡从事档案工作。

到目前为止，只有较少的学者拥有，我被允许使用，直到今年（引者按：即 1869 年）早些时候，它以古董的方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即“被拍卖师的锤子中分散在风中”¹⁴，幽默的莫勒开玩笑式地描述奥西安德相关文献的命运，他从柯尼斯堡大学图书馆、纽伦堡市图书馆等地收集了奥西安德的手稿，竭泽而渔式的搜罗使得他的研究臻于完善：“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我已经把所有的奥西安德的印刷品都看在眼里，这些印刷品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罕见的”，并且他指出：“我在我的书中收录了大量的摘录，因为它们值得比现在更出名。人的全部伟大意义已经从他们的语言中显现出来了。你只需要把改革者对母语的处理与他们的罗马反对者的处理进行比较，就能立即看到他们有精神和力量的证据。”¹⁵

上述提及的涉及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资料整理与生平传记的著作，是奥西安德研究较为基础且重要的成果。除此之外涉及奥西安德的生平事迹的相关研究还可参考大卫·C.斯泰因梅茨《幕后的改教家》（2001）的第八章¹⁶；安德鲁·L. 托马斯的《纽伦堡宗教改革的启示》（2022），这部著作涉及了奥西安德在纽伦堡的事迹，同时也特别关注了奥西安德与犹太人、希伯来思想的关系，最为难得的是此著作整理了一份奥西安德的年谱简编¹⁷。而涉及奥西安德神学的著作则可以参考伊曼纽尔·赫希（Emanuel Hirsch,）的著作¹⁸，阿莫斯·布鲁斯·赖特曼（Amos Bruce Wrightsman）的著作则主要探讨的是奥西安德在科学史方面贡献¹⁹，汉语学界对奥西安德擅自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1543）添加序言的事迹必然很熟悉，奥西安德本意为了保护哥白尼的安全，在哥白尼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著作加上序言，声称著作中的内容都是基于计算的假设，不料更促进了哥白尼学说的传播。

二、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生平事迹

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²⁰，于 1498 年 12 月 19 日出生在纽伦堡附近的贡岑豪森，他出身寒末，是一个铁匠的儿子²¹，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有证据表明奥西安德的父亲也曾经担任过议员²²。按奥西安德的常住地来看，他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出生到 1548 年他基本长居于纽伦堡以及纽伦堡附近，1522 年他正式进入纽伦堡的圣洛伦茨教会任传教士，并为纽伦堡的市政议会服务至 1548 年，此后他则来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并在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直至 1552 年谢世。

¹⁴ Ernst Wilhelm Möller, *Andreas Osiander Leben und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lberfeld: Verlag von R. L. Friedrichs, 1870), VI.

¹⁵ Ernst Wilhelm Möller, *Andreas Osiander Leben und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lberfeld: Verlag von R. L. Friedrichs, 1870), VII.

¹⁶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4-69.

¹⁷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¹⁸ Emanuel Hirsch, *Die Theologie des Andreas Osiander und ihre geschichtlichen Voraussetzung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19).

¹⁹ Amos Bruce Wrightsman, *Andreas Osiander and Lutheran Contributions to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hD dissertation 1970).

²⁰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马丁·斯图波里奇的《奥西安德在普鲁士：1549-1522》是考察奥西安德生平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特别关注了奥西安德与其他人的神学争论，较为清晰地梳理“奥西安德之争”来龙去脉，参见 Martin Stupperich, *Osiander in Preußen: 1549-1552*,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3).

²¹ 关于奥西安德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的不同说法的考证问题也可以参考莫勒的著作，见 Ernst Wilhelm Möller, *Andreas Osiander Leben und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lberfeld: Verlag von R. L. Friedrichs, 1870), 1-2.

²²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4.

奥西安德青年时期的史料并不多，他曾在英戈尔施塔特大学（University of Ingolstadt）学习希伯来语，对希伯来语的精通，可以说是他最为突出的特点。1519年，21岁的奥西安德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担任希伯来语讲师，之后他成为施道比茨小组（*Sodalitas Staupitziana*）的成员²³，毕竟施道比茨（Johann von Staupitz, 1460-1524）1503年就担任着奥古斯丁修会的助教代理，而纽伦堡便在施道比茨的管辖范围内，活跃于此的奥西安德成为圈子成员变不足为奇。同时，路德也同为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并与施道比茨深交，诸多事迹表明奥西安德在此刻成为了路德圈子的重要人物，例如路德发表《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抨击修道院制度：“……我们要讲到那一大群多发愿而少遵守的人。亲爱的诸公，请不要发怒，我的意思实在是好的。有一桩既苦又甜的真理，那即是对于修道院的建立，不应再与允许了。愿上帝帮助我们，现在已有的实在是太多了！巴不得它们全都被废除……漫游遍地，从来就没有产生好结果，将来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结果，所以我主张把十个或更多的修道院合并成一个……”²⁴，在这之后，奥西安德便也对纽伦堡的修道院进行抨击²⁵，可以判断奥西安德至少在此时对路德有很明显的倾向性，在其正式任职为牧师后，奥西安德则开始采用路德的方式布道。此外，奥西安德也利用在空余时间，根据希伯来文来修订武加大译本的圣经（*Vulgate Bible*），并在经文的边缘处加上注释，这一项成果在1522年出版。²⁶

同样是在1522年，奥西安德成为了纽伦堡圣洛伦茨教区教堂（Church of St. Lorenz）的牧师。需要说明的是，纽伦堡作为帝国城市，工商业繁荣、文化发达，许多人文主义者聚集于此地。纽伦堡的不少学者、政要大多都对路德的改革抱有同情，纽伦堡的市政委员会秘书长拉扎勒斯·斯宾格勒（Lazarus Spengler, 1479-1534）是马丁·路德在纽伦堡进行宗教改革的关键支撑者。在1520年教皇颁布了将路德开除教籍的教谕《主，起来吧》中，斯宾格勒也名列其中，这刺激了斯宾格勒抓紧进行了纽伦堡的宗教改革，使得纽伦堡在1525年成为第一个德国的新教帝国城市。²⁷

奥西安德在纽伦堡期间，逐渐通过自己语言天赋与布道口才赢得声誉，他自1522年担任纽伦堡的牧师，一直为纽伦堡服务到1548年为逃避“奥格斯堡临时敕令”（*Augsburger Interim*）才离开此地。奥西安德深耕纽伦堡宗教改革事业多年，无怪乎被称为“纽伦堡的改教家”。几乎是刚一上任，奥西安德便开始按照路德的方式布道，这一行径刚开始惹人担忧，而后便得到了响应：

“当奥西安德几乎是一开始，便立即以毫无疑问的路德宗方式传教，并积极反对教皇和教会教义，这时理事会便感到担忧。但这并没有让他和其他任何传教士保持沉默，例如医院教堂的新人托马斯·盖

²³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164.

²⁴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 Zhi deyizhi guizu gongkaishu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载《路德选集》 *Lude xuanji* [Selected Works of Luther], 徐庆誉 Xu Qingyu、汤清 Tang Qing 等译, (北京 Beijing: 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133.

²⁵ 周施廷 Zhou Shiting, 《宗教改革时期纽伦堡的修道院改革——基于圣佳兰修道院的考察》 *Zongjiaogaige shiqi niulunbao de xiudaoyuan gaige*—*Jiyu shengjialan xiudaoyuan de kaoca* [The Reform of Monasteries in Nuremberg during the Reformation Period: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St. Gallen Monastery], 《世界宗教文化》 *Shijie zongjiao wenhua* [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No. 4, (2013), 76.

²⁶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5.

²⁷ 对于斯宾格勒与纽伦堡的宗教改革研究可以参看周施廷的梳理，见周施廷 Zhou Shiting, 《斯宾格勒与纽伦堡的“路德小组”》 *Sibingele yu niulunbao de “ludexiaozu”* [Spengler and the “Luther Group” in Nuremberg], 《贵州社会科学》 *Guizhou shehui kexue*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No. 11, (2013), 151-155.

肖夫(Thomas Gechau),他在威廉博尔德·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的推荐下于1522年获得了这一职位。他也根据路德(的方式)来传讲福音。”²⁸

1524年,纽伦堡便开始着手宗教改革事业,即使是费迪南大公与教皇使节不断呼吁要果断采取措施打击异端的蔓延,然而纽伦堡的市议会却依旧在拖延时间,以下据说是当时“一位不友好的目击者,对克莱门特教皇的使节坎佩齐奥(Campeggio),于3月中旬进入纽伦堡时的情况的描述”:

“在这座城市里,对基督的真诚信仰被彻底废除了。圣母玛利亚和圣人都不受尊重。他们嘲笑教皇的仪式,把圣人的遗物称为被绞死的人的骨头。在大斋节(Lent),他们公开吃肉。忏悔被忽视了,因为他们说忏悔应该只向上帝忏悔。他们通常以兼领圣血和圣体的方式领圣餐(communicate under both forms)。他们通过流传绘画和漫画,令教皇和红衣主教成为笑柄。简而言之,他们认为马丁是他们的启蒙者,并认为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处于黑暗之中。”²⁹

关于所谓的“兼领圣血圣体圣餐”(communicate under both forms)的问题,其中也有奥西安德的影子。早在此之前,奥西安德与其他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鼓动纽伦堡市民争取在圣餐中接受圣血与圣体的权利,但是这一要求被班贝格的主教魏甘德·冯·雷德维茨(the bishop of Bamberg, Weigand von Redwitz)所拒绝。1523年,随着奥西安德不断地谴责“罗马的敌基督者”(the Roman Antichrist),随着局势愈演愈烈,信徒们直接从修士的手里自己拿过(领圣血的)圣杯,这在当时是被禁止的。因为根据天主教的礼仪,圣餐礼只能“口领”,平信徒不能用手领受,直到今天在天主教的《救赎圣事》(Redemptionis Sacramentum)训令中依旧进行了严格规定³⁰。此外,以往只有主礼的司铎才可在弥撒中领圣血,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后才允许部分地区兼领圣体与圣血的圣餐礼。奥西安德要求让平信徒兼领圣体圣血,必然遭到反对,并最终导致信徒用自己的手去接修士的圣杯,这种种行为在当时的天主教会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奥西安德甚至亲自为丹麦女王伊丽莎白(Queen Isabella of Denmark),也就是查理五世(Emperor Charles V)的妹妹施行兼领圣体圣血的圣餐礼,当时驻节于纽伦堡的教皇使节坎佩齐奥对此也无法阻拦。奥西安德的一系列举动可谓惊世骇俗,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诸如皮尔克海默一开始表示支持奥西安德的行为,但最后又显得怀疑且犹豫³¹。人文主义者常常对路德信徒反抗权威的精神予以支持和同情,但当这些改教家们的言行开始在他们眼中略显过火,便又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起来。这种现象就如同路德与墨兰顿之间的关系一样,用路德用以形容自己与墨兰顿的区别的那段话语来说就是:“我非常粗鲁、暴躁、激烈,总的说来非常好斗。我生来就是要和无数的魑魅魍魉战斗。我一定要清除残根和砾石,斩断乱丛和荆棘,整理荒芜的森林:但腓力先生却轻柔、和气地走来,以上帝慷慨赋予他的智慧将幸福播种并浇灌”³²人文主义者总是试图保持温和的克制,寻求与对手的和解。

²⁸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164.

²⁹ *Ibid.*, p. 174.

³⁰ 《救赎圣事》训令第92条:“每位信友常有权利选择用口恭领圣体。在主教团获宗座认可准予手领圣体的地区,如领圣体者欲以手领方式领受,则必须为他送圣体。不过应格外留意的是,领圣体者应即时在送圣体员面前领下圣体,以免有人用手把圣体带走。假若有褻渎圣体的危险,则不应以手领方式分送圣体。”参见罗马圣事礼仪部 Dicastery for Divine Worship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Sacraments,《〈救赎圣事〉训令(指引)》*Jiushushengshi xunling (zhiyin)* [INSTRUCTIO Redemptionis Sacramentum], 中国台湾地区“主教团”礼仪委员会 Zhongguotaiwan “zhujiaotuan” liyi weiyuanhui [Etiquette Committee of the “Bishop Corps” in Taiwan, China], 中国“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 Zhongguo “xianggangjiaoqu” liyi weiyuanhui [The Etiquette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Diocese in China] 译, 2005。

³¹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5.

³² 转引自[英]R. B. 沃纳姆编 Wernham R. B., eds.,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 *Xinbian jianqiao shijieshi dishanjua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shijielishiyansu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1525年3月3日至14日，“纽伦堡宗教会议”（Nürnberger Religionsgespräch）召开，这一会议将决定纽伦堡的信仰问题，天主教与新教分别排除各自的代表进行辩论。奥西安德除了是纽伦堡圣洛伦茨的传教士，同时也是市政委员会宗教事务的负责人，他作为新教一方的代表对阵天主教方济各会神父恩哈德·埃尼尔（Lienhard Ebner），双方由此展开了关于纽伦堡信仰问题的辩论。奥西安德凭借雄辩的口才以及雄厚的神学知识储备赢得了最终的胜利。³³对反对派来说，这场辩论基本上是被精心操控的，因为主持会议的是腓特烈·皮斯托留斯（Friedrich Pistorius），他是圣塞巴尔德和圣洛伦茨的副院长（priors）、以及圣艾吉迪乌斯修院的院长（abbot），手握大权的他还是一个对维登贝格持同情态度的人，主持会议的还有来自维尔兹堡（Wirzburg）的传教士约翰内斯·格劳曼（Johann Graumann），他则是一个著名的路德宗狂热分子（Lutheran enthusiast）。³⁴天主教会的反对者们在此似乎陷入绝境，毫无胜算，辩论的最后由奥西安德做总结：

“奥西安德最后发言，总结了路德教义对这些条款的立场，并驳回了所有天主教的主张。在他的演讲结束时，他转向了聚集在一起的市长们。他告诉他们不要等待全国大议会（national Council）来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他说，拖延已经耽误了足够的时间。现在就行动起来，根据圣经来建立上帝的仪式。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立场。没有理由再等待更长的时间。”³⁵

奥西安德的呼吁立即得到在场人士的支持，三天之后，纽伦堡变勒令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加尔默罗会禁止布道与听取忏悔，圣徒崇拜被禁止，受难剧、圣体游行与私人弥撒都被废除。

奥西安德在这场注定胜利的辩论中一时间风头无两，声誉日涨，奥西安德在纽伦堡的权势也日益增加。1524年，路德的保护人——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Elector Frederick the Wise of Saxony）访问纽伦堡时，曾在圣洛伦茨教会听了奥西安德的布道，这一次布道让腓特烈印象深刻，甚至于他亲自要求索取一份布道的书面副本。奥西安德随即与腓特烈的顾问斯帕拉丁（Georg Spalatin）通信交流提供布道的事宜。³⁶由于奥西安德出色的语言能力，纽伦堡市议会也经常就一些法律问题的翻译请教他，奥西安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广博学识对纽伦堡宗教改革事业的重要性，他便向纽伦堡市议会提出增加自己薪水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要求。³⁷在1525年，奥西安德也为宗教改革允许教士结婚的规定作出榜样，迎娶了一位名为凯瑟琳娜·普瑞（Katharina Preu）的纽伦堡富商之女，这位妻子一直陪伴着奥西安德，直到1537年她去世了，这段婚姻使奥西安德有了一个儿子卢卡斯和两个女儿——艾格尼丝和卡塔琳娜，值得一提的是卢卡斯·奥西安德后来也曾为了一位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创作过不少众赞歌。奥西安德于前妻凯瑟琳娜去世的同年续弦，与海伦娜·昆霍费尔（Helena Kunhofer）结为夫妻，这次婚姻没有为其留下成年的子女。1545年，奥西安德第三次结婚，与纽伦堡著名的城市医生约翰·马根布赫的女儿海伦娜·马根布奇（Helena Magenbuch），他们有两个女儿，伊丽莎白和厄休拉。³⁸1525年的婚姻所带来的家

Social Sciences] 译，（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79。

³³ 周施廷 Zhou Shiting, 《斯宾格勒与纽伦堡的“路德小组”》 Sibingele yu niulunbao de “lude xiaozu” [Spengler and the “Luther Group” in Nuremberg], 《贵州社会科学》 Guizhou shehuikexue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No. 11, (2013), 154。

³⁴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175.

³⁵ *Ibid.*, p. 176.

³⁶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22.

³⁷ *Ibid.*, p. 24-25.

³⁸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4.

庭义务并不成为奥西安德加紧宗教改革进程的理由，他毫无停歇地与纽伦堡的市政秘书拉扎勒斯·斯宾格勒合作，引入了礼拜仪式和教义改革，加强了路德教会相对于纽伦堡其他政党的地位。他还参与了论战，撰写了各类论文，例如反击方济各会的路德反对者卡斯帕·沙茨盖尔（Kaspar Schatzgeyer）、还有约翰·埃克（Johann Eck）等。³⁹

奥西安德屡次作为纽伦堡的代表参与路德宗的重要座谈与会议。1529年，奥西安德参加了马尔堡会谈（the Colloquy of Marburg），1530年他为奥格斯堡会议（Diet of Augsburg）的讨论作出了贡献，1537年他参与了斯马尔卡德条款（the Smalcald Articles）初稿的起草工作，1540年也出席了沃尔姆斯会议⁴⁰，可见奥西安德在宗教改革事业中的地位的提升⁴¹。奥西安德还是1533年勃兰登堡-纽伦堡教会令（Brandenburg-Nuremberg church Order of 1533）这一具影响力的路德会有组织教会规则首席设计师。同样，他为儿童编写的相关教义问答在16世纪被再版40次，并被翻译成拉丁语、英语、荷兰语、冰岛语和波兰语。

随着地位的提高，奥西安德在纽伦堡的宗教管理权力也愈大，他似乎已经成为路德宗在纽伦堡的代言人，奥西安德还利用他的希伯来语知识来捍卫纽伦堡的路德宗教改革，反对那些被认为是再洗礼派（Anabaptists）信仰的人。⁴²在奥西安德的管辖下，不愿“皈依”的再洗礼派将会被驱逐出纽伦堡：

“再洗礼派如果被抓到的话，便会被送往奥西安德和林克（Linck）那里，他们会试图使再洗礼派皈依；如果他们失败了（就像他们通常做的那样），异教徒就会被驱逐，尽管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会发生）身体受伤或被剥夺财产（的情况）。1528年，市议会发布了《关于牧师和传教士如何劝告和教人们关于再洗礼派的扭曲和腐败教义的基本指示》（*Basic Instruction on How Pastors and Preachers Are to Admonish and Teach the People Concerning the Perverting and Corrupting Doctrines of the Anabaptists*）。该小册子被分发给所有神职人员，作为他们努力保持信仰纯洁和社会安全的指南。”⁴³

除了宗教事务之外，一些研究者的研究也暗示着奥西安德参与了世俗政治，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纽伦堡市政议会向其征求法律方面的建议外，一些可能被归为奥西安德的言论，涉及了他对于当时政治的看法，例如他同意黑森的菲利普（Philip of Hesse）将帝国视为一个有限的君主制国家的形象，并且奥西安德认为“皇帝是通过选举获得权威的，而他能否登上王位取决于是否接受某些条件”。⁴⁴

权力与地位的提升同样具有两面性，渐渐地，奥西安德也开始试图动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的方便与利益。1526年，奥西安德帮助他在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希伯来语老师约翰·伯森斯坦（Johann Böschenstein）谋求工作，把这位老师安排在了当时由墨兰顿领导下纽伦堡的文科学学校担任希伯来语教员。⁴⁵此外，早在开始担任纽伦堡圣洛伦茨教会的传教士时，出于对希伯来文化学习的热衷，他便开始着手建立收集塔木德与卡巴拉作品的图书馆。1529年起，奥西安德为了学习阿拉姆语而寻找犹太教师，不惜谋划动用一些

³⁹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5.

⁴⁰ 此处的沃尔姆斯会议是指1541年雷根斯堡会议之前，于1540年在哈格瑙（Hagenau）和沃姆斯举行的筹备性质的小型会议。

⁴¹ Jeffrey K. Anderson, *Justification as the Speech of the Spirit*, (Eugene: Wipf & Stock Publishers, 2021), 81.

⁴²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26.

⁴³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181.

⁴⁴ Cynthia Grant Bowm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utheran Theory of Resistance: 1523-1530,"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III, 1 (1977), 61-76.

⁴⁵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22.

私人便利。1498年后犹太人禁止进入纽伦堡，奥西安德便要求议会允许一位来自施奈塔赫（Schnaittach）的名为沃尔夫林（Wolflein）的犹太教师和学者每月两次访问他，为期半年。⁴⁶

奥西安德的一些行为肯定在某些程度上引起了同行的反感。纽伦堡的一些居民似乎也对他颇有微词，借着一些公众活动对他进行讽刺。纽伦堡长期以来都有活跃的戏剧传统，人们在节日与庆典上表演戏剧和小品（skits），14世纪以来纽伦堡就形成了一个名为“Schembart”的本土节日，据学者考证这个名称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意指“怪诞的面具”（grotesque facial mask）⁴⁷，在这一节日中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唱唱跳跳，人群中不仅会有贩夫走卒的身影，贵族人士也会加入其中，这应该是类似于中世纪“狂欢节”的活动，直到1539年事情发生了变化：

“戴面具者们偶尔也会失控，在1539年，戴面具者们突然心血来潮想要（引者补充：以狂欢活动）来讽刺热心的新教改革家奥西安德博士，他曾在讲坛上谴责狂欢节是最黑暗的天主教会遗迹，这时市议会便决定禁止整个Schembart，不仅是在1539年，而是永远禁止。即便如此，忏悔节的面具活动（Shrovetide masking）仍然在继续，即便受到了更严格的管制”⁴⁸

事实上，奥西安德一直被描述为“天赋异禀却难以相处”的形象，从他所谓“整个德国找不到十个能和我媲美的人”的自夸便可看出他的高傲，虽然他具有骄傲的资本：精通三种语言并且才华横溢，但经常因此引发争吵，在1540年的几次会议中，他不断惹怒自己的同行，最后受到了排挤：

“他作为路德派代表被派往沃尔姆斯的座谈会，在那里他开始在盟友的阵营中制造麻烦。加尔文被他在餐桌上的谈话激怒了；他对墨兰顿的公开和轻率的批评使他的路德会同僚感到震惊。尽管他原计划在沃尔姆斯和哈格瑙之后参加雷根斯堡的座谈会，但他的代表资格被替换，并被显然受够了的同事无情地送回纽伦堡。”⁴⁹

奥西安德往往容易与他人产生争执，虽然这种充满战斗的性格一度使他在捍卫路德宗信仰时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但一旦矛头调转与教内神学家进行论辩时，便会制造麻烦与纷争。路德曾经苦恼于路德宗内部纷争，在1538年一份写给墨兰顿的信中十分气愤地提及奥西安德：

“下个世纪将有多少个不同的教主？这种混乱将会更加严重。没有哪个教会愿意顺从别人的观念和权威，每个人都要树立自己的‘拉比’：看一看奥西安德尔和阿格里科拉已经在干些什么……而且还会有多么可怕的诽谤！太放纵了！”⁵⁰

1548年，“临时敕令”迫使路德宗的牧师们流离失所，奥西安德不得不离开纽伦堡，前往柯尼斯堡，而此时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已经只剩下四年。1549年1月奥西安德道德柯尼斯堡，随即成为了柯尼斯堡旧城教会（the Altstadt Church in Königsberg）的牧师，同时担任柯尼斯堡大学的神学教授，这一切都有赖于

⁴⁶ *Ibid.*, p. 30.

⁴⁷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214.

⁴⁸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215. 此处杰拉德·斯特劳斯在著作中称呼奥西安德为博士（Dr. Osiander），似有误，因为在其他研究者那里，奥西安德并未拿过一个完整的学位，例如可以参考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21. 以及 Jeffrey K. Anderson, *Justification as the Speech of the Spirit*, (Eugene: Wipf & Stock Publishers, 2021), 82. 关于奥西安德的青年求学生涯的资料确实较难获取，这一问题有待探究，本文并不在此赘述。

⁴⁹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4.

⁵⁰ 转引自[英]R. B. 沃纳姆编 Wernham R. B., eds.,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 *Xinbian jianqiao shijieshi disanjuan*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xueyuan shijie lishi yanjiusuo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 81.

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帮助⁵¹。阿尔布雷希特长期崇拜并支持奥西安德的工作，给予刚刚到达柯尼斯堡的奥西安德许多帮助，这也引起了他人的不满。当然这本身也有柯尼斯堡大学自身的背景原因，施图佩里奇的著作不惜花费 10 页篇幅通过描述柯尼斯堡大学至 1542 年起的内部争斗，为奥西安德之争做铺垫，他认为“可以看出，奥西安德的争论延续了年轻的柯尼斯堡大学的争论传统”⁵²，历史充满诸多偶然性，好斗的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偏偏来到了同样好斗的柯尼斯堡大学，当然选择逃往普鲁士寻求阿尔布雷希特的庇护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二人在 1522 年便相识并互有通信。阿尔布雷希特为奥西安德谋求柯尼斯堡大学的职位，也引起了许多纷争，涉及人事程序等诸多问题，这一件事情也为奥西安德树敌众多⁵³。1550 年“奥西安德之争”正式爆发，其起因是关于奥西安德对于“称义”观念的不同理解，他反对律法称义的冰冷教义（the cold doctrine of forensic justification），墨兰顿首先强调的观点是，称义是一种司法行为，在这种行为中，上帝为了基督的缘故，仅凭信心就白白地饶恕了罪人，并将基督的义归于他们。奥西安德相信人的称义，必然是因为与基督的联合，因为基督的内住（indwelling）而获得更新而称义。奥西安德的理论并没有获得支持，约阿希姆·莫林（Joachim Mörlin）反对奥西安德以致于拒绝领奥西安德的圣礼，普鲁士人加入了对奥西安德的进攻，包括德国其他地区的路德会和瑞士改革派都对奥西安德进行攻击⁵⁴，论争一直持续到 1566 年，而奥西安德没能活到争论结束的时候，他于 1552 年谢世于柯尼斯堡。大卫·C.斯泰因梅茨如此描述这场论战：

“战斗的号角声激起了这位老兵的斗志，他穿上盔甲，磨亮宝剑。他最喜欢的就是打一场漂亮的仗，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发起了反击。他那反对墨兰顿的论战之书页，触摸起来热火发烫。不幸的是，他没能活着看到冲突的解决。”⁵⁵

1552 年 10 月 12 日，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纽伦堡战士最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好辩善论的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用笔与唇舌为路德宗向天主教会的神学家们发起论战，为自己对称义的理解向曾经的小伙伴发起论战，最后也于论战中溘然长逝。

三、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的主要思想与奥西安德之争

奥西安德的著作颇多，十卷本的文集对于在世 54 年的他，不可不谓之勤耕不辍。攫其主要思想，主要有二，一是他对犹太人的宽容，相对于其他改教家而言，奥西安德精通希伯来语，同情犹太人；二是他对称义观念的不同理解，这点直接引发了路德宗内部的纷争，掀起了“奥西安德之争”。

奥西安德对犹太人的同情体现在他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为犹太人辩护，这在当时的改革家中实属罕见。这本题为《犹太人秘密杀害儿童并利用他们的鲜血是否真实可信》（*Whether it is True and Credible that the Jews Secretly Kill Children and Make Use of their Blood*）⁵⁶的小册子出版于 1540 年，奥西安德于其中揭穿了传统的、由

⁵¹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6.

⁵² Martin Stupperich, *Osiander in Preußen: 1549-1552*.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3), 13-23.

⁵³ *Ibid.*, pp. 23-33.

⁵⁴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6-67.

⁵⁵ *Ibid.*, p. 67.

⁵⁶ 这本小册子 1893 年曾在德国再版，见 Andreas Osiander, *Andreas Osianders Schrift über die Blutbeschuldigung*, (Fiencke, 1893). 英译版本可参

来已久的基督教误解，即犹太人是嗜血的恶魔。这引起了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内斯·埃克的嘲笑：“整个纽伦堡都知道，[奥西安德]在讲坛上为犹太人辩护”。⁵⁷当然研究者们也看到了奥西安德对犹太人的同情可能是出于某种功利性的考量——为了更好地让犹太人皈依新教、或者为了更好地学习希伯来语以促进对圣经的理解等等，甚至有时候他可能对犹太人的同情可能是为了反衬天主教会的心胸狭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奥西安德书写这本辩护小册子另有其自己的想法：“他写这本书还有其他原因。通过攻击血腥诽谤，奥西安德还指责天主教徒不宽容和错误的教导。”⁵⁸

对犹太人的同情应该始于他对希伯来文化的兴趣。他对希伯来语的学习，某种意义上也为他对犹太神秘主义卡巴拉（Kabbalah）⁵⁹产生兴趣打开大门。安德鲁·L.托马斯的最新研究试图勾连起奥西安德所受的希伯来影响与他之后对称义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称奥西安德为“基督教希伯来主义者”（Christian Hebraist），并指出：“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深受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基督教希伯来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和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的影响，他们对犹太神秘传统的拥抱体现在卡巴拉中……对奥西安德来说，卡巴拉涵盖了所有的犹太学问”⁶⁰在奥西安德看来：“对圣经来说，没有比希伯来语更有用的语言了”⁶¹，他热情地为希伯来语辩护：“上帝[不允许希伯来圣经被毁灭]……为了造福整个基督教世界，使基督徒能透过希伯来语真正了解自己的信仰”⁶²，希伯来语的研究有助于基督徒了解经文以至于亲近上帝的道。虽然，奥西安德并未获得过任何学位，但是天资聪颖的他掌握了希伯来语、拉丁语以及希腊语，这使得他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三种语言之人”（“man of three languages”，*homo trilinguis*）⁶³，他对古代语言的兴趣与知识储备确实令他在改教家的行列里显得引人注目。如此渊博的语言知识似乎令奥西安德有些忘乎所以，1534年他曾对纽伦堡的市议会强调“整个德国找不到十个能和我媲美的人”⁶⁴。奥西安德所精通的希伯来语教育在后来的论战中，也成为了被攻

考安德烈·L. 托马斯《纽伦堡的宗教改革启示》的附录，参见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223-254.

⁵⁷ Dean Phillip Bell & Stephen G Burnett, eds., *Jews, Judaism, and the Reforma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220.

⁵⁸ *Ibid.*, p. xxvi.

⁵⁹ 卡巴拉，（Kabbalah；希伯来语：קַבְּרָה），按其字面意思是“接受/传承”，是犹太教中的一种较为神秘深奥的法门，涉及了巫术、占星、冥想等。传统的卡巴拉往往是口耳相传密授，带有神秘主义色彩。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及这一学说写道：“卡巴拉是犹太人的秘密智慧。关于它的起源，有许多虚构的传说，其中有许多暧昧的成分。据说这种智慧包含在两部书里，就是《齐耶拉》（创造）和《索哈尔》（光明）……这些就是崇高的卡巴拉智慧的史料来源。这是一堆暧昧的混合物。”，见黑格尔 G. W. F. Hegel, 《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Zhexueshi jiangyanlu (disanjuan)* [Hege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3], 贺麟 He Lin, 王太庆 Wang Taiqing 等译，（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3），167-168。卡巴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与人文主义、基督教思想开始互动，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和约翰内斯·罗伊西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是这一思潮现象中的代表人物。

⁶⁰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19.

⁶¹ “Osiander an den Nürnberger Rat,” (1529), in Andreas Osiander d. Ä. *Gesamtausgabe: Schriften und Briefe*, vol. 3, eds. by Gerhard Müller & Gottfried Seebass, (Gütersloh, 1979), 336. 转引自 Dean Phillip Bell & Stephen G Burnett, eds., *Jews, Judaism, and the Reforma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227.

⁶² “Gutachten über die Blutbeschuldigung,” (before 1540), in Andreas Osiander d. Ä. *Gesamtausgabe: Schriften und Briefe*, vol. 7, eds. by Gerhard Müller & Gottfried Seebass, (Gütersloh, 1988), 233. 转引自 Dean Phillip Bell & Stephen G Burnett, eds., *Jews, Judaism, and the Reforma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227.

⁶³ Andrew L. Thomas, *The Apocalypse in Reformation Nuremberg: Jews and Turks in Andreas Osiander's Wor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2), 21.

⁶⁴ Andreas Osiander d. Ä. *Gesamtausgabe: Schriften und Briefe*, vol. 5, eds. by Gerhard Müller & Gottfried Seebass, (Gütersloh, 1983), 524. 转引自 Dean Phillip Bell & Stephen G Burnett, eds., *Jews, Judaism, and the Reforma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219.

击的地方，他的反对者中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是个“犹太人”——“反对者一再指出，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后裔，似乎不仅仅是他的黑脸和头发”⁶⁵，以此来进行并不道德的人身攻击。

奥西安德对因信称义的看法不同，直接导致了奥西安德之争的爆发，使其自身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1550，奥西安德出版了《如果罪没有进入这个世界，神子是否有必要道成肉身》（*An filius Dei fuerit incarnandus, si peccatum non introivisset, in mundum*）⁶⁶，1551年他又出版了《独一中保耶稣基督与因信称义》（*Von dem Einigen Mitler Jhesu Christo Und Rechtfertigung des Glaubens*）⁶⁷等文章，奥西安德在柯尼斯堡所出版的几篇神学著作涉及了称义与成圣之间的问题，他坚持认为，路德在称义的观念里中包含了人的更新，并将其理解为与基督的个人结合。然而，他断言墨兰顿对关于称义所持有的那种法庭裁判般的理解不忠于路德的意图是错误的⁶⁸。他认为是因为基督住在了我们里面，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赦免不是称义本身，而是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内住而称为义。

奥西安德所强调的那种“内住”，关于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说法颇有点神秘主义色彩，那种“内住”的体验似乎在拒绝冰冷的律法行为之时，也模模糊糊地试图提升人的位置。对此，加尔文对奥西安德进行的强烈的反对，加尔文认为即便基督可以内住于我们，也不能忽视圣灵才是基督与我们之间联合的纽带，他认为奥西安德忽略了这一点，让人误以为我们可以与基督直接合一，“相反，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上帝的主权和权威。是上帝让我们与中保接触。但我们仍然是我们：人。而耶稣基督仍然是他：神人合一的中保。”⁶⁹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问题，那么我们与中保之间的联结就无从谈起，人的救赎问题将无法保证。而且按照路德的观点，不是基督的内住产生的结合带来称义，而是信带来了称义进而带来了人与基督的联合，如路德所言：“信将心灵与基督结合，有如新妇与新郎联合。”⁷⁰恰恰是“信”才能使人称义，才能使人的心灵与基督联合，就像《因信称义联合声明》中所称的那样：“上帝唯独因着信心（*sola fide*）称罪人为义。在信心里他们完全信靠他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并生活于和他的共融（*communion*）之中。”⁷¹

另外，加尔文还认为奥西安德混淆了“重生”（*regeneration*）与“称义”（*justification*）的区别⁷²，这种混淆是因果的颠倒。“更新”是信的显现，按路德宗的教导，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达到称义，路德宗“他们强调人只能（单单被动地）接受称义的时候，其意思是排除个人对自身称义任何有贡献的可能性，却不否定信徒个人全心参与到那凭着上帝的道（*word*）所产生的信。”⁷³称义本身与被称为义后必

⁶⁵ Ernst Wilhelm Möller, *Andreas Osiander Leben und ausgewählte Schriften*, Friderichs, 1870, p.2.

⁶⁶ Andreas Osiander, *An filius Dei fuerit incarnandus, si peccatum non introivisset, in mundum*, (N.p., Lufft, 1550).

⁶⁷ Andreas Osiander, *Von dem Einigen Mitler Jhesu Christo Und Rechtfertigung des Glaubens*, (Bekantnus. N.p., Lufft, 1551).

⁶⁸ 有关墨兰顿教义学对路德思想背离等问题可以参考周小龙 Zhou Xiaolong, 《梅兰希顿的教义学对路德思想的继承与背离》*Meilanxidun de jiaoyixue dui lude sixiang de jicheng yu bei li* [The Inheritance and Deviation of Philipp Melancthon's Dogmatics to Lutheran Thought],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 Jidujiao wenhua pinglun*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vol. 52, (2020), 206-231.

⁶⁹ Wilhelm Niesel. *The Theology of Calvin*. tr. by Harold Knight. (London: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6), 123-124.

⁷⁰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基督徒的自由》*Jidutu de ziyou* [The Freedom of the Christian], 《马丁·路德文选》*Mading lude wenxuan* [Literary selections of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 Mading lude zhuzhuo fanyi xiaozu [Martin Luther Translation Group]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9.

⁷¹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20th Anniversary Edition)*, (Switzerland: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2019), 14.

⁷²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9.

⁷³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20th Anniversary Edition)*,

然产生更新（renewal）是“唯独因信称义”的信条中需要分辨但不应分割的，“称义和更新也于临在信心中的基督内联结起来。”⁷⁴奥西安德很显然将二者混淆。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奥西安德的称义观与路德或者路德宗的些许偏差。奥西安德对于称义的不同看法所引发的奥西安德之争，旷日持久，其内容也斑驳复杂，在此处简单选取了他与墨兰顿和加尔文的不同观点作为典型，论题的深度肯定不止于此。

结语

在汉语学界，奥西安德的研究可谓罕见。对奥西安德的研究是必要的，而这一研究的意义将不仅仅止步于奥西安德本身，它将预示着一个更广大的研究领域的开启，即马丁·路德及其周围人物图卷的展开，以及相关的历史与思想谱系的填补。随着《马丁·路德年谱》（2023）的出版，我们能够可以得出基本的判断是，围绕在路德身边的政治家、改教家、人文主义学者乃至路德的对手们，关涉到他们的研究空间将进一步被拓展，汉语学界关于宗教改革时代的历史将得到更为完整性的描摹。因此，笔者对奥西安德的粗浅梳理只是一个简陋的尝试，更多宝贵的矿藏，有待于更为优秀的研究者来采掘！

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生平年表

1498年，12月19日出生在纽伦堡附近的贡岑豪森。

1515年，17岁，开始在英戈尔施塔特大学（University of Ingolstadt）学习。

1519年，21岁，奥西安德完成在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学习，并在纽伦堡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担任希伯来语讲师，之后成为施道比茨小组（*Sodalitas Staupitziana*）的成员。

1522年，24岁，成为纽伦堡圣洛伦茨教区教堂（Church of St. Lorenz）的牧师，并以路德的方式讲道。其根据希伯来文修订并注释的武加大译本圣经于此年出版。霍亨索伦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of Hohenzollern，即后来的普鲁士公爵）在纽伦堡主持议会时，第一次听到奥斯安德布道。奥西安德开始着手收集希伯来文献并为之建立图书馆。

1524年，26岁，路德的保护人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Elector Frederick the Wise of Saxony）访问纽伦堡时，听了奥西安德的布道，腓特烈对此印象深刻，甚至于亲自要求索取一份布道的书面副本。

1525年，27岁，3月3日至14日“纽伦堡宗教会议”（*Nürnberg Religionsgespräch*）召开，奥西安德代表新教一方作最后发言。迎娶了一位名为凯瑟琳娜·普瑞（Katharina Preu）的纽伦堡富商之女。

1527年，29岁，奥西安德的《如何向上帝祈求和平》（*How One Should Ask God for Peace*）出版，奥西安德、萨克斯和舍恩合作的《罗马教皇的奇妙预言》（*Wondrous Prophecy of the Papacy*）出版。

1529年，31岁，参加了马尔堡会谈（the Colloquy of Marburg）。为学习阿拉姆语，利用职务之便让本被禁止进入纽伦堡的犹太人进入城市教导自己的语言学习。

1530年，32岁，参加奥格斯堡会议（Diet of Augsburg）。

1533年，35岁，参与1533年勃兰登堡-纽伦堡教会令（Brandenburg-Nuremberg church Order of 1533）的编写。

(Switzerland: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2019), 13.

⁷⁴ *Ibid.*, p. 14.

1537年，39岁，凯瑟琳娜·普瑞去世，同年续弦迎娶海伦娜·昆霍费尔（Helena Kunhofer）。参与了斯马尔卡德条款（the Smalcald Articles）初稿的起草工作。

1540年，42岁，出席了沃尔姆斯会议。出版小册子《犹太人秘密杀害儿童并利用他们的鲜血是否真实可信》（Whether it is True and Credible that the Jews Secretly Kill Children and Make Use of their Blood），为犹太人辩护。

1543年，45岁，擅自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添加序言，本意为保护哥白尼，辩称该书内容仅为假设。

1544年，46岁，出版了拉丁文著作《基于圣书的关于末日与世界终末的猜想》（*Coniecturae de ultimis temporibus, ac de fine mundi, ex sacris literis*），德语版（*Vermutung von den letzten Zeiten und dem Ende der Welt*）本于次年出版。

1545年，47岁，奥西安德第二任妻子海伦娜·昆霍费尔去世，同年续弦，与纽伦堡著名的城市医生约翰·马根布赫的女儿海伦娜·马根布奇（Helena Magenbuch）结婚。

1548年，50岁，被迫离开纽伦堡前往柯尼斯堡。

1549年，51岁，1月份到达柯尼斯堡，在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帮助下，成为了柯尼斯堡旧城教会（the Altstadt Church in Königsberg）的牧师，并担任柯尼斯堡大学的神学教授。

1550年，52岁，“奥西安德之争”爆发。奥西安德出版了《如果罪没有进入这个世界，神子是否有必要道成肉身》（*An filius Dei fuerit incarnandus, si peccatum non introivisset, in mundum*）。

1551年，53岁，奥西安德出版《独一中保耶稣基督与因信称义》（*Von dem Einigen Mitler Jhesu Christo Und Rechtfertigung des Glaubens*）

1552年，54岁，10月12日，谢世于柯尼斯堡。

The English Title:

Reformers in Nuremberg: On the Life, Thoughts of Andreas Osiander and The Osianderic Controversy

Guo Siheng, PhD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 Shanghai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s: German classical aesthetics, Chinese modern art theory, religious aesthetics. E-mail: shgforkh2020@126.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0992-0339>

Abstract: Martin Luther was the main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and this "correct" historical impression obscured the achievements and ideological disputes of many reformers. Andreas Osiander wa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eformers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yet his life story and main ideas are rarely seen in Chinese-language scholarship. 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y of Osiander's scholarship, digging out his life story and main ideas, as well as the ideological polemics he triggered, we aim t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Osiander's reform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store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research on reformers other than Martin Luther, so as to paint a more in-depth and detailed picture of the Reformation in its entirety, and to broaden 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speaking scholarly community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Andreas Osiander; Religious reform; Nuremberg; The Osianderic Controversy